

# 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轻度违法的影响作用

黄任之 李则宣

**【摘要】目的** 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对轻度违法,主要是品行障碍方面的影响作用,从实证的角度验证文化迁移的影响作用。**方法** 通过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等系列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 124 名流动儿童适应文化变迁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 ①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品行障碍问卷上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54 \pm 2.64]$  vs.  $(1.01 \pm 0.45)$ ,  $t = 54.33$ ,  $P < 0.01$ ; ②与城市儿童比较,流动儿童有更高的集体主义  $(8.15 \pm 0.79)$ ,  $t = 2.274$ ,  $P < 0.01$  和更低的个体主义  $(4.73 \pm 0.45)$ ,  $t = -17.31$ ,  $P < 0.01$ ; ③在 ASQ 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低于城市儿童 ( $P$  均  $< 0.01$ ),在 ASQ 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高于城市儿童 ( $P$  均  $< 0.01$ ); ④除负性情绪维度外,主观幸福感量表(SWS)各维度评分流动儿童均低于城市儿童 ( $P$  均  $< 0.01$ )。**结论** 文化适应不良会导致流动儿童没有发展出独立自我,滋生出更多的轻度违法行为,这与他们习惯于自我归咎的归因方式,有着更多的负性情绪和更少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关键词】**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迁移;流动儿童;轻度违法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1886/j.issn.1007-3256.2015.05.004

## Influence of cultural adaption on the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HUANG Ren-zhi<sup>1\*</sup> LI Ze-xuan<sup>2</sup>

<sup>1</sup>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sup>2</sup>Xiangya Second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NG Ren-zhi E-mail: rebecca2001138@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between children of migrants and the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mainly interfering conduct disorders). **Methods** 124 children of migra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Scale, Conduct Disorders Checklist, Attribution Style Questionnaire (ASQ)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S) and interviewed after filling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①The mean scores of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and the metropolitan children were  $[7.54 \pm 2.64]$  vs.  $(1.01 \pm 0.45)$ ,  $t = 54.33$ ,  $P < 0.01$ . ②Compared to the metropolitan children,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had lower individualism  $(4.73 \pm 0.45)$ ,  $t = -17.31$ ,  $P < 0.01$  and higher collectivism  $(8.15 \pm 0.79)$ ,  $t = 2.274$ ,  $P < 0.01$ . ③The migrant children's positive attribution style score of ASQ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etropolitan children ( $P < 0.01$ ). In negative attribution way score of ASQ, the migrant children higher than that of metropolitan children ( $P < 0.01$ ). ④The score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WS except the negative emotional dimension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was lower than metropolitan children. **Conclusion** Acculturation could lead to migrant children do not develop independent self and cause more mild offenses, then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with their self-ascribed attribution, more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Key words】**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Cultural transfer; Children of migrants;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青少年的犯罪率在移民国家有逐渐上涨的趋势<sup>[1]</sup>。近年来,各派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虽然美国是个高犯罪率和轻度违法的工业国家,

但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犯罪率是不相同的<sup>[2]</sup>。有研究显示,青少年暴力主要以欧洲裔和非洲裔青少年为主,鲜有研究报道亚洲裔青少年存在暴力倾向<sup>[3]</sup>。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南亚人移民到美国前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大多数东南亚人移民是因为战争、迫害或想逃离因战争而分裂的祖国,而东亚人(以中国、日本和朝鲜为主)移民到美国主要是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地位<sup>[4]</sup>。

文化适应是一个接触两种不同文化而做出改变

项目基金:湖南省科技厅科研项目(2014FJ3139),湖南省教育厅[2010]243号NO.452)

作者单位:41020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黄任之);41001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李则宣)

通信作者:黄任之, E-mail: rebecca2001138@163.com

的过程<sup>[5]</sup>。跨文化研究发现,移民就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结构中,进一步容纳新的文化。这会带给移民者许多文化冲突并让他们出现心理震荡和行为异常。相关亚洲青少年暴力的文献也强调,文化适应和移民可以解释轻度违法和暴力行为<sup>[6]</sup>。对东南亚的青少年来说,文化适应意味着要将集体主义导向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准则改变为个人主义导向。有研究表明,文化传入和青少年暴力的相关可能是由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信念的改变所导致的<sup>[7]</sup>。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被视为两种对立的文​​化倾向。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不强调个人的价值而看重集体的目标和利益,人际关系是相互依存和关注外部环境,因而习惯于外部归因。而在个体文化下,个体成员都在意自己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治,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幸福和内部归因。跨文化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多倾向于个体主义,而亚洲文化则倾向于集体主义<sup>[8]</sup>。移民需要适应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化取向,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个体化的发展过程。

对青少年来说,个体化过程涉及到发展认同,需要与家庭分离而自治。这个过程需要在亲子关系上出现改变,这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改变<sup>[9]</sup>。个性化的过程还包括增加自治、独立性和与父母进行情感分离。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个性化发展过程:一是适应相关的差异(与父母或同伴减少联结)导致一些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例如健康合理的自我依赖;另一种就是通过反叛或蔑视,目的是释放父母的控制和依赖,以此形成的个性化<sup>[10]</sup>。有研究表明,虽然处在不同的群体中,但在增加与父母情感分离的过程采用的方式却非常一致<sup>[11]</sup>。Fuhrman 等<sup>[12]</sup>认为分离可能更多是由文化环境所决定,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相互依赖可能比依靠自我和自治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

Tyson 等<sup>[13]</sup>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更多地将轻度违法评价为严重事件。Wong<sup>[14]</sup>发现,保持一种集体主义文化(比如中国儒家文化)会降低卷入轻度违法活动的可能性,因为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认为轻度违法不算什么,通过反社会制约和规范来确认自己独特的个性,与家庭分离,因而更多地从事这些活动。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认为,这些行为的可能后果会造成自己与父母或他人关系的不和谐,他们就不会产生轻度违法的行为。

在现代中国,“文化混血”现象促使了社会学家

对文化适应的关注。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礼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对社会个体而言,更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包括对涉入新环境的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药物依赖、酗酒、吸烟、饮食习惯及不良行为的研究。流动儿童是农民工带着进城、随同他们一起在务工地点共同生活的孩子。流动儿童随着父母漂泊,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由于抚育方式简单,他们是最容易受到文化适应冲击的群体。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超龄现象严重及失学情况普遍。据权威调查显示,2005年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子女约1000万,其中9.3%失学,这些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儿童不仅耽误自己的前途,也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为了解流动儿童从农村的集体主义文化转到强调个人主义的城市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心理功能的改变是否会导致青少年轻度违法的高危因素,本研究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倾向和品行障碍进行了相关研究。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流动儿童的定义,结合有轻度违法经历如偷窃、攻击他人造成轻伤等轻度违法行为的经历,制定了入组标准:男童(既往研究中提到轻度违法的青少年多为男性),年龄10~16岁,有过违法行且处于管制状态,无精神障碍,口语表达正常。通过集体取样的方式,选取湖南省接受特殊管制的124名流动男童作为研究对象,年龄11~16岁(14.25±1.94)岁,受教育程度:小学43.7%,初中56.3%。从湖南省某社区取同年龄、同性别的120名城市儿童作为对照组,年龄11~16岁(14.65±1.03)岁,受教育程度:小学10.5%,初中52.6%,高中26.9%。两组儿童均来自当地同一所中学和同一所小学,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hi^2=11.6$ ,  $P>0.01$ )。

## 1.2 研究工具

1.2.1 美国精神病学分类诊断标准(品行障碍) 品行障碍的标准采用自我评估方式,共20个判断条目:“我曾经虐待过动物”、“我常常挑起斗殴”、“我常常欺侮、威胁或恐吓他人”等,选择“有”计1分,选择“无”则计0分。各项评分之和为总评分,总评分越高,反映儿童轻度违法的程度越高。

1.2.2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sup>[15]</sup> 用于测试文化倾向,其中16个条目测量个体主义(如“我是独特的

人”) ,另 16 个条目则测量集体主义(如“家人的幸福对我很重要”)。采用九点评分,“完全不同意”为 1 分,选择“完全同意”则计 9 分。在个体主义分量表或集体主义分量表上评分越高,说明他的该种文化倾向更明显。

1.2.3 归因方式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 [16] 郭文斌等在 ASQ 中提供了 10 个关系情境(5 个正性事件,如“某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请写出一个主要原因”;5 个负性事件,如“在公共场合被人踩了一脚,请写出一个主要原因”),要求对自己归纳出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行三个维度的判断:主要原因是主观还是客观因素(内在-外在)、是否还会继续存在(持久-暂时)、是否影响生活其他方面(整体-局部)将三个维度评分相加求平均数,得出正负性事件的总体指标。高分表示个体倾向于归因为内在的、或持久的、或整体的,低分则表示个体归因于倾向于外在的、或暂时的、或局部的。

1.2.4 主观幸福感问卷(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S) [17] Dionei 编制的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对这三个对生活的主要 5 个方面的描述,如“我的生活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吻合”、对一个星期的情绪(包括积极情绪如“自豪”和消极情绪“嫉妒”)和对整个生活的幸福痛苦体验(从 1 分的“非常痛苦”到 9 分的“非常幸福”) ,要求被试分别进行自我评价。以上问卷的信度、效度都经过多次研究检验,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1.3 评定方法 让儿童在各自的班级里统一填写问卷,时间约为 50 分钟。在完成了系列问卷调查后,研究者还对部分流动儿童进行访谈,用以了解流动儿童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借以了解他们的轻度违法是否与文化适应存在一定的关联。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4.0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为均数比较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差异性检验 Chohen d, 检验两组儿童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

表、DSM-IV 诊断的品行障碍标准、归因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而检验社会文化适应是否与轻度违法存在着一定的相关。为了更好地避免统计的二类错误,一般引入了效应量 (Effect Size, ES) 这一指标,效应量的数值代表了两组均数之间的差异大小; ES 增大,统计检验效能增大。根据 Cohen 的观点, *d* 值 < 0.2, 则说明效应量为小; 0.2 < *d* 值 < 0.8, 说明效应量为中等; *d* 值 > 0.8 则说明效应量大。

## 2 结 果

2.1 两组品行障碍问卷评分比较 与城市儿童比较,接受管制的流动儿童品行障碍问卷评分更高 [(7.54 ± 2.64) vs. (1.01 ± 0.45) *t* = 54.33, *P* < 0.01]。

2.2 两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评分比较 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评分上,接受管制教养的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01)。在集体主义分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高于城市儿童;而在个人主义分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低于城市儿童。见表 1。

表 1 两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评分比较( $\bar{x} \pm s$ , 分)

组 别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评分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流动儿童 ( <i>n</i> = 124)	4.73 ± 0.45	8.15 ± 0.79
城市儿童 ( <i>n</i> = 120)	7.89 ± 0.65	7.05 ± 0.85
Chohen d	-3.24	1.258
<i>t</i>	-17.31	2.274
<i>P</i>	<0.01	<0.01

2.3 两组 ASQ 评分比较 在 ASQ 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低于城市儿童(*P* 均 < 0.01);在 ASQ 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高于城市儿童(*P* 均 < 0.01)。见表 2。

表 2 两组 ASQ 评分比较( $\bar{x} \pm s$ , 分)

组 别	ASQ 评分					
	内部-外部(正性)	持久-暂时(正性)	整体-局部(正性)	内部-外部(负性)	持久-暂时(负性)	整体-局部(负性)
流动儿童 ( <i>n</i> = 124)	3.25 ± 0.75	3.38 ± 0.60	3.12 ± 0.54	2.90 ± 0.43	2.68 ± 0.94	2.79 ± 0.64
城市儿童 ( <i>n</i> = 120)	4.16 ± 0.49	3.97 ± 0.35	3.98 ± 0.67	2.12 ± 0.60	2.13 ± 0.08	2.18 ± 0.74
Chohen d	-0.79	-0.59	-0.99	1.24	0.63	0.67
<i>t</i>	-7.015	-5.846	-8.467	8.429	5.212	5.468
<i>P</i>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 2.4 两组 SWS 评分比较 除负性情绪维度外, SWS 童均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 0.01$ )。见表 3。 的人生感受、正性情绪、总体幸福感维度评分流动儿

表 3 两组 SWS 评分比较( $\bar{x} \pm s$ , 分)

组 别	SWB 评分			
	人生感受	负性情绪	正性情绪	总体幸福感
流动儿童( $n = 124$ )	3.43 ± 1.05	3.15 ± 0.68	3.80 ± 1.02	4.48 ± .68
城市儿童( $n = 120$ )	5.62 ± 1.04	2.38 ± 0.72	5.69 ± 0.98	6.26 ± 1.87
Chohen'd	-1.36	0.86	-1.73	-1.47
$t$	-13.125	7.957	-13.174	-10.463
$P$	<0.01	<0.01	<0.01	<0.01

从 Chohen'd 值来看,各个均数比较的差异均  $> 0.5$  除了 ASQ 的内部 - 外部(正性)、持久 - 暂时(正性)、持久 - 暂时(负性)和持久 - 暂时(负性)的效应量为中等程度外,其余均数比较的效应量都很大,说明两组数据的平均值差异极为显著。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接受管制的流动儿童品行障碍问卷评分高于城市儿童,说明被管制的流动儿童有着更多的品行障碍和轻度违法的经历。在集体主义分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高于城市儿童;而在个人主义分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低于城市儿童,这说明较之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需要发展更多的独立自我。流动儿童从农村被带入城市,生活的环境从高度的集体主义文化转向强调个体特征的城市文化,需要增加更多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社会文化适应过程。流动儿童的轻度违法,的确与社会文化倾向存在明显的关联。流动儿童有着更高的集体主义和较低的个体主义,较之于同龄的城市儿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倾向带给他们的心理困惑。比如,访谈中多次听到流动儿童反映“城里的人不好接近,他们太傲气了”、“到了这里,特别孤独”、“没有人会在意你干什么”……城市生活需要个体保持一定的独立自我,比如建立自己的目标,相信个体是独特和独立的,行为自治。显然,部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并不是那么顺利,他们会感知到更多的社会差别,甚至歧视<sup>[15]</sup>。文化适应不良也会带来一些心理功能损害,这种损害是内隐的,会影响他们的归因方式和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低于城市儿童;在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

童高于城市儿童。两组的归因方式差异极大:对于正性事件,城市儿童更多地是采用内部归因方式,认为这是持久的,可以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负性事件,城市儿童更多地认为这是外部原因,认为这是暂时的,并且不会波及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流动儿童则相反。这说明流动儿童对正性事件往往是外部归因,而对负性事件进行内部归因,他们会将积极事件的发生视为非主观原因,否定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将坏的事件更多地归咎于自己的过失或能力,有过度承担责任的愧疚心理。和大多数人一样,城市儿童倾向于将正性事件归因为内在的、持久的和整体的,而将负性事件归因为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这种归因模式被称为“自我服务偏向”,他们会认为个人拥有各种良好的人格特质,而回避有损于心理平衡的消极认知。流动儿童并不擅长使用这一心理策略,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会将文化冲突带来的负性事件更多地归因于个人的原因;将正性事件则归因于外部因素,这是一种自我归咎模式,容易诱发更多的负性情绪<sup>[16]</sup>。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SWS 的人生感受、正性情绪、总体幸福感维度评分中,流动儿童均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 0.01$ )。流动儿童对人生持有消极的态度,表现出较少的积极情绪和较多的负性情绪。流动儿童的幸福体验不强,达不到中等水平。反之,城市儿童对人生的看法较为乐观,积极情绪占大多数时间,消极情绪比较少,对生活的主观幸福感评价比较高。

人口迁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动和生活习俗的差别,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结构的重塑,要求新成员适应新的社会文化。本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不良会带来一定的社会行为失范,产生一些违法行为。从理

论上支持了国外关于移民青少年的轻度违法与文化倾向关联的观点。从教育实践来看,流动儿童在适应环境中,采用顺应、退避、抵抗的策略,会影响他们独立自我的形成。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有很强的身份困惑。近 90% 的流动儿童否认自己是城市人,超过 10% 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部分流动儿童甚至在身份认同上产生矛盾和困惑,成为“双重边缘人”。虽然在城市生活很久,对城市非常熟悉,但许多流动儿童依然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还是“农村人”、“外地人”,有的犹豫着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喜欢哪里”。有的孩子虽然愿意在城市定居,但仍自称“我们农村人”,表明他们的自卑意识依旧存在,平等自尊等教育理念还需要加强<sup>[18-20]</sup>。这是未来流动儿童心理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促进其社会化,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只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与轻度违法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对其他影响因素和其中复杂的心理机制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未来需要纳入更多的社会文化因素,采用犯罪档案的质性分析等研究方法,所得的结论则更为有效。

### 参 考 文 献

- [1] Melissa S, Charles P.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2014 National Report [R]. National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2014.
- [2] Snyder H, Sickmund M.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2006 National Report [R]. National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2006.
- [3] Synder HN, Sickmund M.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1999 national report [R].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1999.
- [4] Le TN, Arifuku I, Louie C, et al. Not invisibl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juvenile arrests in San Francisco Country [M]. Oakland, CA: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011.
- [5] Berry JW.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M.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M]. Boulder, CO: Westview, 1980.
- [6] Zhou M, Bankston CL. Straddling two social worlds: The experience of Vietnamese refuge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ERIC Clearinghouse on Urban Education 2000.
- [7] Le TN, Stockdale GD.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delinquency in Asi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05, 34(4): 681-691.
- [8] Singelis TA, Triandis HC, Bhawuk DPS, et 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 theoretical and measurement refinement [J]. Cross-Cultural Research, 1995, 29(3): 240-275.
- [9] Noack P, Puschner B. Differential trajectori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s [J]. J Adolesc, 1999, 22(6): 795-804.
- [10] Ryan RM, Lynch JH. Emotional autonomy versus detachment: Revisiting the vicissitudes of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 Child Dev, 1989, 60(2): 340-356.
- [11] Bray JH, Adams GJ, Getz JG, et al. Individuation, peers and adolescent alcohol use: A latent growth analysis [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3, 71(3): 553-564.
- [12] Fuhrman T, Holmbeck GN. A contextual-moderator analysis of emotional autonomy and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J]. Child Dev, 1995, 66(3): 793-811.
- [13] Tyson GA, Hubert CJ.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seriousness of delinquent behaviors [J].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2013, 10(2): 316-324.
- [14] Wong SK. Delinquency of Chinese-Canadian youth: a test of opportunity, control, and inter generation conflict theories [J]. Youth and Society 2014, 29(1): 112-133.
- [15] 黄任之, 姚树桥, 邹涛.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信度和效度的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6): 564-565.
- [16] 郭文斌, 姚树桥, 蚁金瑶, 等. 归因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3, 11(2): 92-95.
- [17]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 [J]. Social Indication Research 2002, 57(2): 119-169.
- [18] 张翔, 杜建政.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行为适应的关系研究 [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5, 23(9): 924-926.
- [19] 郝振, 崔丽娟. 受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 中介机制及自尊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2): 137-144.
- [20] 刘霞.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13, 36(1): 116-121.

(收稿日期: 2015-09-02)